



九批判书

因为文，所以能琴棋书画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；因为质，所以能如孔融面诋魏武，梁漱溟「考验」领袖。作者身处学林之中，临几振衣，既是省人，也是自省。

章启群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YT PRESS



九批半 判书

因为文，所以能琴棋书画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；因为质，所以能如孔融面斥魏武，梁漱溟「考验」领袖。作者身处学林之中，临几振衣，既是省人，也是自省。

章启群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批判书/章启群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-7-301-15421-2

I . 九… II . 章… III . 社会科学—文集 IV 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5190 号

书 名：九批判书

著作责任者：章启群 著

责任编辑：王立刚

封面设计：含 元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301-15421-2/B · 0806

出版发行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：pkuphilo@163.com

电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编辑部 62752025

印 刷 者：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650mm × 980mm 16 开本 14.75 印张 200 千字

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28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。

——帕斯卡尔

序 优雅距离我们有多远？

1

上世纪 20 年代，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，徐志摩与林徽因陪同。当时报纸报道：林徽因人面桃花，泰戈尔仙风道骨，长袍白面，加上郊寒岛瘦的徐志摩，犹如苍松瘦竹春梅的三友图，成绝世佳品。

画面中的林徽因、徐志摩，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神采的剪影，定格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神骨峻。它流传在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的记忆中，让人们至今羡慕、仰望，不能忘怀。

其实，那个时代，除了林徽因、徐志摩，包括鲁迅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陈寅恪、冰心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梁实秋等等文坛名流、学界翘楚，尽管他们所专不同，信念有异，性格更是南辕北辙，但其精神气象无不让人感到神清气朗，如光风霁月。

假如有人倡议，我们在全中国海选，再凑成一幅三友图，作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神特写，那将会是一个什么图景？

当然，泰戈尔是伟大的印度诗人，我们无法用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诗人取代这个高鼻深目的雅利安人。海选也是无法实行的，因为这与电视剧演员的海选毕竟不同。我这样说不过是一个假设。但是，认真搜索一下中国的名流学者、教授们，我们可以试着找出几个人，与林徽因、徐志摩

站在一起比试比试，例如大红大紫的明星教授们……这将会是一幅什么图呢？

在当下中国，美男靓女满大街都是，影视明星、歌坛新秀、美女作家、模特、超女、中国小姐、世界小姐、以“脱”一举成星的“星”们、以“跑”一举成名的名人，还有学术大师、大腕、讲坛擂主、名嘴……可是，我们却难以凑成一幅朗月清风的三友图。

差别在哪里？

不是外形的漂亮，不是表面的聪明才气，甚至也不是知识和思想。真正的差别，概而言之：一为雅，一为俗。有“雅”，于是脱俗。缺“雅”，于是入俗，甚至俗不可耐。

雅，或曰优雅、雅致，是个什么东西？

不说虚的玄的，还是从林徽因说起。人们眼中的林徽因主要有两点：美丽和聪明。沈从文说林徽因是“绝顶聪明的小姐”，费慰梅说林徽因“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”。卞之琳说：“她天生是诗人气质、酷爱戏剧，也专学过舞台设计，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，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。”费正清说林徽因“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、诗人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，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著迷人的魅力。在这个家，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，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著她转”。萧乾在《才女林徽因》中记道：“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，还经常得卧床休息。可她哪像个病人，穿了一身骑马装……她说起话来，别人几乎插不上嘴。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，而常是有学识，有见地，犀利敏捷的批评……她从不拐弯抹角，模棱两可。这种纯学术的批评，也从来没有人记仇。我常常折

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。”可见林徽因几乎是男人眼中的天使和菩萨。爱她的男人我们知道的有三人，或许还有无数的暗恋者。这三人中，徐志摩是最奋不顾身的追求者，梁思成是她的终身守护者，金岳霖爱得真挚、深沉，终其一生。从他对采访者的回答就可看出：“我所有的话，都应该同她自己说，我不能（与别人）说，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，我不愿意说，也不愿意有这种话。”

林徽因是优雅的。优雅不仅仅是锦衣玉食、琴棋书画。早年林徽因历经繁华，她的堂姐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绘她当年的衣著打扮、举止言谈是如何地令她们倾倒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林徽因既能耐得住学术的冷寂，又能抗得住生活的艰辛。她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，奔波于穷乡僻壤、荒寺古庙之间，历经千辛万苦。抗战期间困居李庄，亲自操持柴米油盐，在几乎一贫如洗、疾病缠身的困境下，仍执意要留在祖国。李健吾闻知此情激动地说：“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，梁启超的儿媳。其后，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，他们拒绝了，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。”这是真正的大雅之士！

从林徽因身上，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优雅的品质。

没有优雅，尽管有靓丽的外貌，不过花瓶摆设；有一点知识，不过雕虫小技；有一点小才小智，不过哗众取宠。整个人生仍然逃不掉一个字：俗。

我们的时代，举世茫茫，从市井小民、商贾优伶，到军警政法、官员学者，能寻出几个风清骨峻的优雅之士？找到几个才情并茂的优雅之女？

的进步。除此之外，文化是社会进步、发展的内在标志。文化与GDP有关系，但不能等同；与科技水平有关系，也不能等同；文化与博物馆、少年宫、科技馆、体育馆、歌剧院有关，但不能等同；与社会的教育程度有关，也不能等同。文化发展的水平有很多指标，但是，它可以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、尤其是知识分子身上。

一个有序的社会，应该展示出文明的向度和层次。中国至少在三千年前的西周就建立了礼乐秩序。文明与野蛮就体现在君子和小人（野人）身上。受过教育的、代表当时文明教育成果的人是君子，因此，君子是当时社会的理想人格。孔子教学生就是以君子人格作为目标。他教学生以“六艺”，并说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提出“文质彬彬”的品质标准，这是当时对于贵族子弟的最低要求，也代表着当时文明的向度。汉代以后出现的“三礼”，详细论述了“礼”的意义、价值以及具体规定。“五经”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必修课。完成了这些教育就达到当时的文明水准，就是那时的文化人，具备君子人格的必要条件。相反，不能达到这个文明水准，不能自觉遵从礼乐秩序的，就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奴隶、平民，即小人或野人。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十分明确，就是以君子人格作为理想的人格。当然，这里面有贵族的特权思想，有阶级差异，这都是时代的局限性。可是，这一切不能否定它的合法性。

君子人格理想的传统在中国世代相传，延续了几千年。君子与小人（野人）之分，是高尚与卑下、文明与野蛮、文化与反文化的分野。知书达礼一直是中国对于文明的共识。斯文扫地是对于知识分子失范或某种颠覆文化价值行为的谴责。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是坚守君子人格的最后底线。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理想，君子人格理想对于社会全体成员都是一个典范。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，无论是官僚、商人还是农民，都自觉

认同而不会反对这一社会共同价值理想。于是，它构成了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，对于社会秩序起到制衡作用，成为社会文明的一根指挥棒。

因此，在中国古代社会，社会的上层，贵族、官员、士大夫、富商大贾、乡绅，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，尚礼是基本要求，斯文是行为标准，因为礼仪廉耻是君子人格一个门槛。所谓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”，讲的是信用；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，是内在品德与外在言行的双馨。他们即使不敢认为自己就是君子，但绝对不以小人自居。因为，在那个社会，被公认为小人的人，不仅没有身份，也没有信誉和道德可言，基本上被排斥在文明社会的社交舞台之外。即使是刚刚摆脱贫困的暴发户，无论他先前多么低贱、落魄，也要穿起马褂、长衫，附庸风雅。还一定让子弟读书应试，获取功名，因为不读书难以达礼。当年混迹上海滩的流氓头子杜月笙，发迹之后堂皇隆重地请人修家谱，把自己说成是杜甫后裔。这种事说来荒唐可笑，其实却体现了一种文明的向度。毕竟，它比现在的暴发户在豪华餐厅胡吃海喝斗狠斗富要有文化。

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中，中国历史上的忠臣烈士不胜枚举，杀身以成仁的壮举史不绝书。当年梁漱溟在中南海怀仁堂，当面向毛泽东、周恩来正言，他要考验一下执政党有没有雅量，考验一下主席有没有雅量，体现的就是这种君子人格的伟大精神，成为现代中国君子人格精神的绝响。

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人格理想，代表着社会的文化向度，体现了文明社会的秩序。钱穆先生曾认为，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农村文化。因为一代代乡村读书人，通过科举，走进皇城大都，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，而他的后代又逐渐衰落，被新的乡下读书人取代。进入国家管理中心的人才基本上来自乡村的有志青年。如果没有知书达礼、君子人格的社会价值理

想的指引，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延续、发展是不可能的。

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理想相异，君子人格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任何价值。至少，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共识，没有体现这种文明的向度。要不要把自己培养成君子人格，不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，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。因为，它基本上不影响当下每个中国人的升官发财。君子人格既不是学历，也不是技能，更不是资本，实际上没有任何好处和实际利益。按照君子人格的要求，自觉维护和遵守一些道德操守，甚至是作茧自缚，也许在社会生活中生存更加艰难。而做一个小人，则没有任何坏处，既不会丧失任何东西，而且不受任何道德约束，也许在社会生活中顺风顺水，获得很多实际利益。所谓礼义廉耻、信用仁厚、刚正不阿，这些东西都不能产生直接利益，因而人们往往弃之如敝屣。相反，只要能产生实际效用、利益，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被千夫所指，有些人也在所不惜。最简单直接的是骂人，特别是骂名人，其次是公示自己的艳照，还有的甚至挑战社会伦理底线，只要产生轰动效益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

人们对于“耻”的渐渐麻木，导致了一种反文化的社会倾向，痞子化于是应运而生。痞子化即是反文化的典型表现。当下中国，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，都在下意识追求痞子化。不管是无业游民、暴发户，还是歌星影星、政府官员，甚至文人学者，也迎合下流低俗，不知不觉痞子化了。“我是流氓，我怕谁？”——就是这个倾向的总宣言。

痞子化在当下中国渐呈汹涌之势，挑战一切文明的秩序，冲击几千年的礼乐传统。在这样的景况之中，试问：国人何来优雅？

3

君子人格理想的摧毁，根源在当代中国教育。

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人格。教育，首先是培养人的教育，即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。至少从孔子开始的中国传统教育，一直以培养君子人格为首要。所谓“传道授业解惑”，首先是传道。这是教育最基本要求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而我们当下的教育被人称为应试教育，升学是这种教育的最终指向，于是，分数实际上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。家长和学生都把学校当成技能培训班，当成发财升官的桥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学校里的品德教育只能是花拳绣腿。我们的学校因此忘记了教育最根本的任务：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？

通过调查我们知道，在今天中国的学校，一般的孩子也谈自己的理想。他们的理想无非将来成为科学家、影星、商人、经济学家、教授、部长、总理等等。这既是他们自己的理想，也是家长和老师对于他们的寄托。落实到学校生活中，这些理想都是具体的，就是上好学校，例如北大、清华、哈佛、剑桥，等等。因此，读书是为了考试，上好的学校是为了找到好工作，总之不外乎升官发财一类。因此，他们的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考试。更可悲的是，离开考试，有些学生就一无所能，甚至惶恐不安。

然而，他们没有人格理想。没有人想成为一个君子，尤其是那种穷愁潦倒、家徒四壁颜回式的君子。也没有人畏惧做一个小人，甚至羡慕那些以小人之道获得巨大的利益成功者，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。更没有人要成为英雄，那似乎一点也不切实际。

一个缺少君子人格理想的社会，人格就会猥琐，唯唯诺诺就成为一种

普遍的社会现象。因此,在任何机构,上级就是法官,哪怕只是一个科长、处长,权威形同上帝,没有人敢对他们的错误提出异议。上下级关系于是成为主奴关系。想想当年的梁漱溟,我们应该反思: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学校能够培养出来吗?

中国教育在人格教育上的缺失,导致受教育者和没有受教育者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,因而失去了教育自身的神圣性。教育的这种失误,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无序状态不仅是推波助澜,甚至是釜底抽薪,具有根本否定的功用。

有关当前中国教育的问题,后文将展开论述,这里就毋庸赘言了。

简言之,优雅是文化品质的根本体现,是社会文明的标尺。优雅缺失,恶俗必然成为时尚。检视一下当下中国艺术界,春节晚会就是一面清澈的镜子:搞笑逗乐、插科打诨、装疯卖傻成为主旋律,滑稽小丑变成舞台上的主角!从商业大片到学术讲堂,俗不可耐的东西无处不在,我们无法阻挡,无处躲避。

一个失去优雅的国度,无论它的人民多么富足有钱,珠光宝气,宝马香车,美轮美奂,却免不了总带着俗陋、野蛮的气息。

目录

序 优雅距离我们有多远？ /1

甲 思想批判/1

一 我们的人文精神为何悄然离去？

——论知识分子与文化“书面文本”/2

二 学术性为何成为问题？

——从中国美学说起/15

三 诗人自杀究竟有什么意义？

——评刘小枫先生的一个观点兼谈海子自杀

事件/30

附录一 从对传统文本的误读透视顾城事件/44

附录二 中国美学：众里寻他千百度/48

乙 教育批判/65

四 当前中国教育的潜在破坏性分析及其对策/66

五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？

——从黄全愈先生的素质教育观念谈起/76

六 教育杀人，罪犯买单

——追问傅成励血案的深层问题/92

附录一 大学如何才是大学？ /103

附录二 北大的改革也需要大手笔/111

附录三 中学语文教材的科学性如何保证？/118

丙 学术批判/123

七 “实践美学”为什么走向终结？/124

八 如何探讨中国艺术精神？

——质疑徐复观对于《庄子》“道”的理解/146

九 “政治天文学”之说能否成立？

——与江晓原先生商榷兼谈古代天文学向占星
学的转折/167

附录一 关于《庄子》的通信/195

附录二 武则天与历史理性/213

跋/218



甲 思想批判

由于我们描绘的当下的中国文化是一种无根的文化，我们在丢弃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、道德理想等等之后，并没有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体系来取代它们。这道先就造成了与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的混乱，并直接导致他们在行为上的失范。

一 我们的人文精神为何悄然离去？

——论知识分子与文化“书面文本”

1

弗洛伊德理论认为，在每个人的无意识深处，都有一个“我是谁”这样的问题。可以推想，“何为知识分子？”大概也是读书人群体无意识中的秘密和情结。

古代中国的圣贤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和要求是很高的。曾子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孔子说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，……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孔子甚至还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这里的知识分子不仅是“士”，还是“君子”，再进一步就是“贤人”、“圣人”，即张载所要求那样的人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（《张载集·近思录拾遗》）这与其说是界定了“知识分子”，不如说是界定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。当然，在中国，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准则和目标。所以，中国历史上救国救民、可歌可泣的忠臣烈士、英雄好汉不胜枚举。但是，我们决不能说，不是忠臣烈士的读书人，甚至是像秦桧、周作人这样对民族有罪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。这说明，从一种政治理想或者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界定知识分子，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。

2

在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中,我很赞同祝东力先生提出的观点。他在援引了马克斯·韦伯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后指出:“可以说,知识分子最低限度的职能是掌握、传承、创制文化。具体地说,主要是掌握、传承、创制书面文化,即通过写作而固定下的各种文本的世界。这个最低限度的职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——由此派生出知识分子的其他职能。因此,书面文化的特性成为理解知识分子本质的起点。”^①

我认为,这里的“写作”应该做更宽泛的解释,它并非仅仅指用语言文字来书写,而是包含“创制”和“生成”的含义。因此,“书面文化”应是“各种文本的世界”,不仅包括文字的典籍,还包括各种艺术的作品、文化建筑物,以及一切具有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各种物质载体。比如,一种社会风俗、习惯,是一种文化。如果我们把它记录或拍摄下来,就成为“书面文本”。胶片、录音带、录像带,与文字书籍一样,都是一种文化的物质载体,都是文化的“书面文本”。

知识分子的最基本职能是掌握、传承、创制文化的“书面文本”,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文化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因为,文化的历史正是通过这些“书面文本”的流传,才得以承续和发展。知识分子实质上是这种“书面文本”的承担主体——创制者和解释者。如果没有知识分子,原始形态的文化,像民间的艺术、宗教、哲学甚至技术,等等,都难以得到保存、流传,更难以发展。所以,各世界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,都会出现不同形式的“书面文本”。否则,一种文化要么断绝,要么始终处于原始形态。这大概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。这里又涉及文化发展中“雅”与“俗”的问题。

^① 见《美学与文艺学研究》第二辑,第21页。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4年。